

风雨中前行：论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

吴燕红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50)

摘要：慈善公益事业是陈嘉庚一生被赞颂的重要部分，他以实业为依托，以福建为据点，层层推进，并将慈善与实业、教育连为一体。由于陈嘉庚实业的衰败和近代中国时局的双重影响，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出现了扩展与停滞不前的现象。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开始对慈善公益事业进行新的探索，取得了新的突破。

关键词：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近代中国

陈嘉庚（1874—1961），又名甲庚，字科次，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陈嘉庚是中国近现代史和近现代华侨华人史上一位伟大的传奇人物，他集实业家、教育家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早年陈嘉庚以学私塾读书为业，间有一段经营、学商、管理货银账项经历。成年后的陈嘉庚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他都在致力于经营实业、教育、慈善。1894年在故乡集美创办“惕斋学塾”伊始，开启了“教育乃兴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传奇之旅，先后在国内和侨居地热衷教育事业，兴办教育事业长达67年之久。

学界对于陈嘉庚的研究，围绕陈嘉庚的人物生平、教育思想、爱国精神等各个方面展开的学术研究，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研究成果显著。另外有关陈嘉庚的研究已跨越了史学，拓展到经济学、建筑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跨学科研究已成为研究新突破的亮点。学界对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涉及，并取得一些成果。本文主要从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的构建，实业衰败和中国近代社会对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的影响及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建设的尝试进行论述。

一、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的梳理

对于慈善公益，陈嘉庚未必有仔细的考究和科学的认识，但他却在动荡的时局、战乱的烽火、祖国建设的探索时期，他将自己几乎全部的资金奉献在地方的建设和慈善事业，囊括赈灾济民、学校教育、卫生健康等各个方面。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是近现代慈善公益事业的一面飘扬的旗帜，引领着社会的风尚，指导着慈善公益事业的继往开来。

（一）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的建构

1887年—1888年（清光绪十三年至十四年），同安县年景不好，瘟疫肆虐。1889年，陈嘉庚仍在私塾读书。因学业的断断续续，教学的传统古板，十六岁的陈嘉庚识字甚少，学业进步迟缓。正值对知识的渴望，囿于封建传统文化的束缚，加之陈嘉庚日常所学的知识大多是源于族里乡亲的口口相传，对传授的古文知识及报刊文字一知半解，这使他对旧式教育的弊病有深刻的认识。从学科来说，由于学习的知识没有分门别类，只知“天下”，甚至对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无所知。陈嘉庚对更多知识的学习得益于母亲的言传身教。母亲孙氏，一介农妇，但深明大义，极富爱心，在村里有极高声望。母亲的身教言传，潜移默化，在陈嘉庚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重公利，重道义”的观念，长辈的善行对于陈嘉庚来说起着一种导向性的作用。清末，动荡的时局，颠危的国运，使他认识到报国的关键在于教育。教育兴，则国家兴。近代以来，由于国家积贫积弱与政府的无能与不作为，结果是民不聊生、民治不开、民心不齐。通过教育，可以启迪民智，凝聚国民力量。陈嘉庚的出国经历与实业经验，使他愈发觉得教育的重要性，这也是他不惜一切金钱殚精竭虑兴办教育的缘由。1890年17岁的陈嘉庚首次出洋来到新加坡，历经了父亲的破产，一贫如洗的生活，

陈嘉庚开始探索自己的实业生涯。1904年春陈嘉庚购置土地，种植菠萝，创立菠萝罐头厂。他睿智的商业头脑，敏锐的商业直觉，后涉猎多项实业。有了原始的积累及经营经验，1916年把目光转向橡胶实业，经营有方、管理有度，盈利超乎预期，成为南洋橡胶大王之一。至此，他的实业探索走上了快车道，走向了新的高峰。

（二）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的辉煌成就

有了实业的坚强后盾，陈嘉庚解决了慈善实业的资金来源，这让他认真思考、合理规划并践行他的慈善事业蓝图。1894年他在故乡集美创办惕斋学塾。兴办慈善公益离不开资金来源，对此陈嘉庚十分清楚，慈善公益的发展，皆靠他的实业发展。他依靠自己的实业为依托，在集美创办了小学、中学、师范、女子学校、水产航海、商科、农林等学校。1921年4月6日独资开办厦门大学，并亲自指导和设计厦门大学的校舍，并承担厦门大学经费。同时陈嘉庚也在海外投资办学，他相继为新加坡同安县和仙门郊区创办学堂积极捐资，后捐助同安县阳翟小学，创办了道南学堂。据资料显示，从1915年—1949年的34年间，福建华侨捐资兴办的中学就有48所，几乎遍布福建各地侨乡。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的建构过程呈现出以点带面、辐射身边的特点，这也说明他的慈善模式得到了认可。

兴办慈善公益，陈嘉庚考虑的是集美、福建需要什么，什么样的适合集美、福建，而非盲目的追求新颖。对福建乃至整个中国而言，在危机四伏、人心惶惶的战乱时代，群体渴望提供生存下来的条件，不仅包括温饱问题的解决、团体的保护而且包括心理依托。1917年直隶境内遭遇百年一遇特大水灾。堤岸相继冲溃，决口数百道，洪水滔滔，泛滥各地，京畿一带顿成泽国。陈嘉庚改变了他原来只兴办教育的慈善公益建构，改为赈灾济民、救急民众，通过成立救济会，筹募赈款活动，急救受祸难胞，保证民众能活下来，渡过难关。在此基础上，陈嘉庚又将慈善公益、实业、教育、救国连为一体，以期改变社会旧貌。

卢沟桥事变，极富有爱国情怀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华人纷纷成立救亡团体。为更好援助祖国抗战，海外华侨成立了“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选举为主席。根据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统计，整个抗战期间（1937—1945年），海外华侨一共捐1322592652元国币。其中南洋华侨的捐款“约占三分之二”。除了巨款外，南侨总会也为抗战捐献了大量的物资，如汽车、衣服、药品等以备祖国抗战之需。南侨总会筹赈祖国，为祖国的抗战胜利提供巨额资金及大量物资。这些资金的筹募，物资的捐赠与陈嘉庚本人具有出色的组织领导才能分不开的。

陈嘉庚的倾资办学，首先是从自己的家乡集美开始，随着实业的扩大，他将自己的慈善教育拓展到了厦门，创办了厦门大学。陈嘉庚从教育无国界到慈善救济无国界，无不体现了他慈善公益事业由点及线，由线到面层层递进，层层辐射的特点。陈嘉庚的

慈善公益事业也由原来单一的教育慈善到社会救济，赈灾等多维方向的突破，是近现代慈善公益事业的独创。

二、实业衰败和中国近代时局对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的双重影响

1931年以后，陈嘉庚的实业开始走下坡路，以实业为依托慈善公益事业开始缩小范围。加之中国近代的社会环境，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烙上时代的深深印记，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呈现了慈善公益的扩展及停滞不前的局面。

（一）实业下坡路：改变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

1928年，陈嘉庚的胶品制造业受到严重打击。加上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物价暴跌，陈嘉庚的实业首当其冲，这也促使着他对他慈善事业做出相应的改变，以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即使在经济危机和外来力量的压迫下，陷入实业、慈善两难境地市，陈嘉庚仍一心致力耕耘教育。当朋友建议他停办学校或缩小学校规模，他断然拒绝。1934年，所有营业收盘之后，他亲自向侨胞募款，买马来西亚橡胶园充作厦大建校的资金。

1937年，集美、厦大虽能维持现状，但设备缺乏，难以发展，深恐误及青年，陈嘉庚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将厦大无条件移交国民党政府接办，改为“国立”。虽然实业的下坡路，这并没有挫伤他对慈善教育的热情。即使身在国外，可陈嘉庚依旧关心着集美的教育，他通过书信，关心着集美教育的效果、学校的治安、卫生和管理等等。陈嘉庚个人实业的下坡路，慈善事业也由原来的由点及线，由线到面的辐射结构向内紧缩，以及到后来的缩减只投资集美慈善公益事业。因实业的影响，他再也没有雄厚的资本倾资兴学，他的实业者身份，限制了他慈善公益事业向更宽，更广的领域拓展。

（二）时局影响：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扩展与停滞不前

慈善公益救济，往往与灾荒，时局动荡连一起。近代的中国，国家危难，政府财政困乏救济力度有限，那样民间个人慈善就有了生长的缝隙，为受灾的百姓提供了生存的可能。动荡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人民经受战争，贫困与灾荒的折磨。这促使了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的扩展，另一方面，也使他慈善公益事业停滞不前的境地。

1917年的天津水灾，与此同时，加拿大夏里碧水灾、火灾。1928年的山东惨祸，1934年，新加坡发生历史上罕见的大火灾，七千多人无家可归。1935年，漳泉各地发生水灾，9月，他在“救济闽南水灾游艺会”上的开幕词对慈善公益的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认为慈善公益重在人人参与，能力强则可多贡献，能力较弱者，亦可贡献一份力，众人的参与即可达到慈善公益的目的。卢沟桥事变后，陈嘉庚以个人的身份就行捐款，或以福建会馆名义组织赈济，积极领导筹募救济款的活动，将募得国币汇回祖国。近代中国的时局，改变着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扩展了他慈善公益的广度。陈嘉庚从教育无国界到慈善救济无国界，由原来单一的教育慈善到社会救济、赈灾等多维方向转向。

中国幅员辽阔，灾害现象时有发生。著名史学家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阐述中国“灾荒之多，世界罕见”。大难当前，政府应该肩负起救灾的工作，可国家时局动荡，政府在灾荒面前也无能为力。如1917年的天津水灾。此次京直水灾为数十年来未见，灾区广达103县（京直地区所属共140县），受灾率达73.57%。大水灾发生时，北洋政府集团忙于内部权力的争夺和军阀之间的混战，无暇顾及灾区难民的死活。灾区之广，难民之多，政府的救济款10万元只是九牛一毛。陈嘉庚认为，人应自动赈济，力量较大者多出，力量较少者少出，则救灾之目的亦可以达。陈

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深深地烙上时代的印记。他将慈善公益扩展了它的广度，囊括了筹款救济，赈灾组成筹款团体等。囿于实业的影响，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

三、建设的尝试：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

1949年后，归国的陈嘉庚，以敏锐的政治触觉感受到家乡的前景，在脑子构思着日后集美和厦大及中国的发展蓝图。回国后的陈嘉庚，把慈善公益事业上升到一个新阶段。

（一）身份改变：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的建构

回国后，陈嘉庚的身份开始改变，由原来的实业家升级为政府官员，这是陈嘉庚参与政治的开始。新的身份推进了他的慈善公益事业。以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来看，他的官员身份和政治光环确实为福建民众带来诸多实惠，并在一定时期内确保他慈善公益的扩展。对于地方慈善之事，他更是牵挂心上，主动作为担当。陈嘉庚回国后，决定回乡定居。1955年，启程到主要城市参观考察，开启规划并设计建设祖国的蓝图。他一手抓家乡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另一手将自己熟悉的慈善公益事业大胆构建，大胆实施。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由原来的慈善教育、筹款赈灾、卫生等方面面向教育、赈灾、卫生环境、建博物馆、捐献文物等多方面的展开。此时的他不仅是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动者，还是慈善公益事业的领导者。

（二）新突破：陈嘉庚慈善公益事业的新攀登

慈善事业的拓展，是陈嘉庚在实践中实现理想抱负的结果，更是时代推力的结果。新时代呼唤着新的事物，“变”成为时代发展的自身要求。百废待举的中国，是对传统社会的部分否定，这时需要注入新的内容及活力，以适应社会需要。他拟订了一个重建集美学校的计划。第一步，清理受灾现场，修筑道路，救济灾民。第二步是建筑新村，除原有学校外，将恢复农林师范，增办华侨师范和工矿学校。这给战后的集美师生鼓舞，给大变革中的社会新的方向，这也激励着他自己在新的岗位上践履他的职责和使命。

1956年9月，他撰写了《倡办华侨博物馆缘起》，文中阐述了博物馆应是人民群众获得知识的场所。陈嘉庚的慈善教育由原来的学校教育扩展到普通大众潜移默化的教育。华侨博物馆于1959年5月建成，它融合了祖国文化与侨居国文化。馆中的绝大部分陈列品是陈嘉庚搜集，他呼吁国内外华侨踊跃捐献文物。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与祖国的建设同时进行，相互促进。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由集美向厦门再到福建展开。形成了由小范围到大范围的辐射建构。他的慈善公益事业打破了原来的教育、卫生、救助筹款的局限，向建博物馆、捐献文物，普及大众教育等多方面的展开。

四、余论

陈嘉庚的一生，从晚清、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无不印上时代的深深烙印，时局改变着陈嘉庚的思想，也影响着他慈善公益事业的建构。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以实业的盈利为依托，以福建为据点，层层铺开。由于时代及实业下坡的双重影响，陈嘉庚的慈善公益事业出现了缩减和停滞不前的双重局面。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慈善公益事业看成是他建设祖国、发展祖国事业的重要部分。他言传身教，将慈善公益事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 [1] 董立功. 陈嘉庚与道南学堂 [J]. 寻根, 2020 (3) : 5.
- [2] 任贵祥. 陈嘉庚对创立新中国的重要贡献 [J]. 文化软实力, 2016, 001 (004) : 69-71.